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四三期 ——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3c)

【当事者言】	1977：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	杨银禄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九）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言】

1977：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

• 杨银禄 •

近年来，不断有文章描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形。这些文章有的过于简略，有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讲出当时的真实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 愁云惨雾散开去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政坛也发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逝世。

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全党和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无不担忧中国的前途命运。“四人帮”则加快了抢夺最高权力的步伐，使得中央无法正常工作。党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于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愁云惨雾终于散去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被组织上派到钓鱼台9号楼和西城区按院胡同41号院，清理登记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资料、书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开始做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最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写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及中央办公厅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京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况。我对这些文章不敢恭维，有的讲得很简单，未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则大谬不然，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具体地讲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写了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意见。意见说，要根据每个批判对象的罪行，选择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批判。例如对江青，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和反党乱军等罪行；对张春桥，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对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舆论工具鼓吹反对经验主义、伪造和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等罪行；对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办公厅和长沙告状等罪行。

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时间和方法，意见中提出：批判会预定11月下旬开始，12月上旬结束。对四个批判对象分别批判，每个对象批判两个半天。批判会要讲究效果，要开得有点战斗气氛。发言要简短有力，有根有据，要有发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读。每个发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20分钟左右。发言过程中可以穿插质问、呼口号。批判中要讲政策，叫批判对象坐着，回答问题时再站起来，不要罚站，不要骂人、打人，不要叫他（她）们低头弯腰，不要搞“喷气式”。总之，不要用“四人帮”煽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时武斗的方式来批判“四人帮”，不要搞他们那一套。

意见还将参加批判的人员编为三个分组。我当时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所以参加了第二组的警卫局分组。11月25日上午7时，我们乘坐三四辆大轿车和几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地从城内出发开往昌平县秦城监狱。中南海距离秦城75公里，1小时40分钟后到达。批判会于9时正式开始，11时结束。批判的第一个对象是“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

◇ 江青态度比较差

批判会会场约二三百平方米，大门开在东北角，西南两边摆放着桌椅，供出席批判会的工作人员坐，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很显然是供批判对象坐的。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扼要地重申了批判会的纪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声：“把江青带上来！”只见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她以前曾经戴过的黑边近视眼镜，昂首挺胸，大步走了进来，故意装作“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样子。狱警示意她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稳后，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等待主持人发话。江青表现得很镇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限于时间，集中批判了江青的六个问题——

第一，对工作人员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对工作人员缺少爱心、关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对工作人员迫害的手段极多，有训斥、辱骂、打人、体罚、赶走、停止工作、逼迫检查、劳动改造、政治审查、隔离软禁、逮捕入狱等十几种。她动不动就给工作人员扣上“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盗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过，没有受过江青虐待迫害的几乎没有。下面是工作人员对江青的当面批判——

我非常气愤地问：“江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江青听到问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

上平静下来，傲气十足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你是杨银禄。”

我说：“你知道就好，你原来是我们的座上客，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了，我够老实的了。”

我说：“你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点同情心吗？1968年1月初，我的老父亲因劳累成疾，不幸去世，党组织考虑到我刚到你那里，还没有接前任秘书阎长贵的班，也没有正面接触过你，就批准我回老家料理我父亲的丧事。这本来是很正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你起了疑心。我从老家回来以后，你不但向我表示任何同情，还扯着嗓门质问我：‘你回家干什么去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回答说：‘我父亲死了，回去办丧事去了。’你又厉声厉色地质问道：‘你父亲真的死了吗？谁给你作证？我怀疑你父亲没有死，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们好干坏事，我派人到你老家，把坟扒开看看是不是你父亲？！’你还没有等我回答，就大骂起来：‘混账，你给我滚！’……1973年6月11日晚上，你从外边回来，一进门你就对我说：‘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给春桥、文元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春桥、文元同志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想去看的话，我们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个招呼。’我立即在十号楼门口分别给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姚文元的秘书郭文打了电话，张春桥的秘书和姚文元的秘书分别报告他们的领导后都说，他们看过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厅把他们的秘书的回话内容报告了你，你当时说：‘我自己去看。’你没有看电影就跑到张、姚住地，问张、姚‘这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张春桥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姚文元也撒谎说：‘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们的谎话，立刻就说：‘小杨撒谎，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批评你：‘江青对待工作人员从来就是这样，用人家的时候不关心，不帮助，不想用人家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几个罪名，扣上几顶大帽子，一脚把人家踢开，从她那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高高兴兴地出来安排工作的。主席还说，江青是个蠢货……江青，你不是说，我们挑拨你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吗？我们怎么挑拨你和张、姚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老实交代！’

江青说：“是工作关系。”

刘真同志批判说：“周淑英同志你还记得吧？小周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她一个人围着你转，给你穿脱衣服，穿脱鞋袜……你对这样一位善良贤惠、白璧无瑕、勤奋好学，热情、周到、细致地为你服务的好同志、好护士，非但一点也不领情，相反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会作派去的特务，是林彪在你身边安插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给你‘吃了5年毒药’。什么是毒药？那不就是你每天离不开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药吗？！你忍心将这样一位好同志投入监牢？！”

讲到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声。

刘真同志继续说：“周淑英同志被你赶走以后，由赵柳恩同志接替她的护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觉前，按照你的吩咐和医嘱，小赵明明给你放了一份备份的安眠药，你吃了以后硬说没有给你放，非要再吃一份，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奋了，更睡不着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你吃了毒药，你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教小赵这样干的。你就把周总理、叶帅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骗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对杨银禄、赵柳恩、周金铭兴师问罪。你毫无根据地把小赵和黄永胜联系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扒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说小赵不配戴领章和帽徽。你对一位文静贤惠的女孩无端地大耍权威，实在令人发指。”

这时江青低声说：“我不是还给她了吗？”

我说：“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险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记得在你的保险柜里放着，你找不到，就诬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声嘶力竭地对我说：‘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过了一会儿，你叫毛远新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文件在你的保险柜里，钥匙你自己拿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你的身上，说我偷了你的文件，这不是有意陷害人吗……除了有意陷害我们以外，你怕你搞阴谋诡计的材料落到别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听了以后，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第二，崇洋媚外，捞取资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应我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访问，访问期间，邓颖超、康克清大姐会见了她。维特克又提出想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认为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好机会，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高兴地谈了6个小时。后又破格以高标准宴请了维特克女士。晚宴后，江青兴高采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剧场观看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看完戏又与维特克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

周总理规定“谈上一个钟头”，可江青已超过5个钟头，还认为没有尽兴，未达目的，要求到广州继续谈，而且要谈解放战争和其他问题。周总理知道后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满脸不高兴，大发雷霆：“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的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广州又同维特克谈了6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7次，达60多个小时。

在广州，江青同维特克一见面就说，我跟你谈的你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这就是你的范本，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做第二个斯诺；并吹捧美化自己说，“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在谈话过程中，江青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特别是把党内斗争的机密情况和党中央多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决议及解放战争的作战情况等泄露了出去，还把一些没有公开过的作战地图、资料送给了维特克，如《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8种图表。江青还泄露了我军在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中的损失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

在谈话时，江青恐怕维特克听不懂，记不全，多次问维特克：“你听懂听不懂？听得枯燥不枯燥？记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了，给你寄去，甚至录音带也可以给你。”

江青为了取悦维特克，在广州的6天时间，天天宴请维特克，用针线把茉莉花串起来，做成了手链，用针线把玉兰花骨朵串起来，做成项链，每天上午亲自给维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样的手链和项链。维特克临走时，江青亲自送行，并满怀希望地说：“盼望早日看到你的书。”江青送给维特克的礼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诗源》、《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窃取国家的宝贵物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抄家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所有抄来的物品被编号登记造册后，开始卖给（等于赠送）中央领导人，价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只是象征性地收几个钱。一开始江青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便宜事，还是康生、叶群告诉她的。有一天，叶群带着她的“战利品”到钓鱼台十号楼摆在大客厅的大条案上，让江青欣赏。江青看后动了心。那天以后，连续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几次，猎取了不少贵重物品，其中有价值几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金壳蓝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币），明清时期的笔、墨、端砚，各种书籍、古画，还有稀贵的刻图章用的鸡血石、玉石等。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到毛家湾林彪的住所参观，发现他们猎取的文物作为证据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钓鱼台以后，叫毛远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并叫毛远新向文物管理处要收条。毛远新说，不能要收条，要了收条就留下证据了。江青说，还是远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来。江青还想把留下的部分卖掉，一是想得到一笔巨款，二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因为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又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江青听了以后，没有反驳。

第四，江青与林彪的关系

关于江青和林彪的关系，主要揭发三个问题：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国武斗的联手制造者。

林彪散布谬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坏人打坏人是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工作人员说，你们二人配合得不错，你们是搅动派性，煽动武斗的罪魁祸首。你们合起伙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听了以后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错误，我负责！但我不是对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问题。

我说，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关锋等人炮制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炮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会议上叫喊：“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就指使王力、关锋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你看后让“赶紧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责任。王、关被揪出来以后，你说是王、关搞的；戚本禹出了问题，你说是王、关、戚搞的；陈伯达出了问题，你说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你又说，是林彪、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总而言之，你诡辩来诡辩去无非想说明此事与你江青无关……1973年1月，中央专案组将“揪军内一小撮”炮制经过的原始材料清查以后，你在大会堂福建厅看了那份材料，恼羞成怒，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搞专案搞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对我说：“小杨，你给我作证。”我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证，所以我没有吭声。你回到钓鱼台以后，仍然对我说：“专案组的路线不对头，他们竟然搞到我头上来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来的，真是岂有此理。”你是叫我作伪证呀，我没有上你的当。

江青听了以后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间的电话联系，便知他们之间是何关系。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9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470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表达互相关心、互相问候、互相祝愿、保重身体之意。

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妄图“和平夺权”的阴谋被挫败已经过去8个月了，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毛主席也批评了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通了一些什么电话呢？1971年4月29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5月2日，江青在电话里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叶群又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林办的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4个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电话：“谢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4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地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第五，反对和陷害周总理

1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又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等人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

此次大会之前的10多天时间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江青居住的十号楼秘密开会，研究24、25日的会议内容、方法等问题。江青为了封锁消息，对工作人员作了“四个不准”和“三个要”的规定。“四个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议论，不准外出，（除了到十号楼参加会的人外）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律不准进入。“三个要”：到机关食堂吃饭要两人以上；吃饭时，如果有人问什么事，回来要马上汇报；十号楼，不论黑夜白天都要锁上门。

一天，江青问秘书刘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怎么死的吗？是自杀还是他杀？王良恩是一个坏人，他是总理的人呀。他好像是总理的私人秘书，王良恩能参加政治局会（列席）是总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问题与总理有关。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指《纪要》），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总理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有一天，周总理刚刚做完手术，江青就想把总理从三〇五医院赶走，说：“三〇五医院那个

地方舒服，我想去。”

1975年6月28日，江青写给毛泽东主席以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查送到周总理那里，叫总理看，江青几次打电话催总理快点看。第一次打电话，总理休息。第二次打电话，总理正在治疗，江青就发脾气了，大声说：“他不看，就给我退回来。”总理那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看东西非常困难，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总理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众戴黑纱，她说：“共产党怎么还搞大出丧，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车里看到一个人戴黑纱，就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怎么还戴黑纱！”中央通知江青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江青很不愿意去，说：“我前天已经告别了。”不得已，江青还是去了。在向总理遗体告别前，护士特意提醒她告别时要脱帽，但她故意不脱。全国人民看到她戴着帽子向总理遗体告别很气愤。

江青听后说：“我一直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脱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脱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她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时毛主席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毛主席擦背，又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医生主张让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却不断地送一些一般情况的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处于垂危状态，江青一定要给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不听，硬是给主席翻了身，结果主席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扬长而去。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她对对身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并不是要害问题，所以揭发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员的罪行时，她可以静听，表现得很镇静，并私下表示可以向他们作检讨。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X X X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X X X！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公安部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还严厉地批评了参加批判会的主持人，说：“事先不是给你们交代过要注意政策吗，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要在肢体上跟她发生冲突，再给同志们强调强调，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只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

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 张春桥一言不发

1977年11月29日、30日上午，对张春桥进行了两次批判，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对《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1月21、28日，毛泽东主席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中央1976年一号文件）：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3日，张春桥就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指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文件——作者按）。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张春桥认为，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会提议他任国务院总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有感》充分暴露了他对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的强烈不满。

批判人当场质问张春桥：“政治局开会议审议一号文件时，你参加了没有？”张春桥板着脸，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批判人又问：“你既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会后又表示极为不满，你这不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的两面派吗？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我们认为你拥护毛主席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你不仅反对毛主席，你还反对党中央。”对于这样的尖锐质问，张春桥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二是批判他对周总理的治丧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周总理的丧事安排。会议中治丧办公室提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不论在京的或是外地的，都要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张春桥以不满的口气问：“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要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吊唁活动，拟安排6万人参加，共5天时间时，张春桥又说：走资派还在走，不能影响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压缩。在讨论悼词的内容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悼词中“周恩来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评语，极力反对，不同意写进去。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最后那个部分（指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作者按），笼统地、简单地讲几句就行了，不要展开写。”在讨论由谁来致悼词时，江青、张春桥极力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说：“现在全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王洪文说：“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说：“由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比我更合适。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一直在主

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应该由他来致悼词。”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会后，列席会议负责悼词起草工作的李鑫、周启才问汪东兴：“悼词中被删去的那句话怎么办？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而且应该再展开，写得更具体实在些。”汪东兴对他们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悼词由邓小平同志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可带着修改后的清样直接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示，并说明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去为好。”李鑫、周启才带着修改好的清样直接到邓小平家中，报告并表达了他们的建议。邓小平看了一遍清样，毅然在稿子上亲手加上了那句重要评语，并在清样上写了“送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圈阅同意，挫败了“四人帮”企图贬低周总理的阴谋。

三是揭批张春桥在发生“天安门事件”时的反动言论

1976年清明节，在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因此遭到诬陷。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分。1977年11月，我们面对面批判“四人帮”时，虽然“天安门事件”还未正式平反，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此时，对“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所犯的罪行，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

批判人对张春桥说：“在1976年4月5日凌晨，你站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对着天安门广场咬牙切齿地说：‘北京市连这点事都对付不了，用高压水龙头激嘛！’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说：‘那怎么行呢！’你张春桥说：‘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群众闹事，不就是这样干的嘛……’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你张春桥竟然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

批判人继续说：“你张春桥以上这些反革命言论的用意很清楚，企图利用这次‘事件’制造更大的事端，更加残酷地镇压对你们‘四人帮’强烈不满的人民群众；同时嫁祸于邓小平，促使党中央、毛主席对邓小平采取更加严厉的处分，达到一箭双雕的罪恶目的，你这一招多么阴险毒辣！”

说到这里，张春桥没有任何表情，仍一言不发。

四是批判张春桥的老婆叛变的问题

有证据证明，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战争年代叛变过。批判人质问张春桥：“你的老婆文静是不是叛变过？”张春桥不说话。第二次质问，仍不说话。第三次质问时，逼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那不是叛变，是临时失去了与党的联系。”

张春桥被批判了两个半天，不管别人揭什么批什么，他不是低头不语，就是仰面不言。有的人实在耐不住性子了，气愤地说：“张春桥，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呀！”这样刺激他，他也一声不吭。

◇ 姚文元问啥说啥

12月1日上午对姚文元进行了批判。

姚文元胆子比较小，显得很紧张，头冒虚汗，有时两个腮肌肉抖动，眨着一双大眼睛，特别注意工作人员的发言。有时他没听清楚，还问一下：“你刚讲的是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基本上是问什么说什么，态度比较老实。

对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三个问题：

一是姚文元四次为江青作证

第一次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查找鲁迅手稿的情况。因为当时傅没找到江青，无法进入钓鱼台，随即与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电话联系后进入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江青闻讯后恼羞成怒，诬陷傅崇碧是私闯钓鱼台，到钓鱼台是来抓人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据说有癫痫病史，没有见过这种激烈的斗争阵势，精神一刺激，紧张得晕了过去，手中的公文包掉到了地上。江青立即高喊：“他拿皮包打我！”无论傅崇碧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紧急会议，把问题说得更严重了：“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腹部……”姚文元是全程亲历者之一，本应替傅崇碧说几句公道话。但他为了讨好江青，连做人的良心都不要了，竟然随声附和为江青作证。

第二次是1972年1月28日晚12时，毛主席突然生病，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没有摸到，工作人员紧张起来。周总理知道后，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当江青去了以后，毛主席已经苏醒。江青离开主席的卧室来到值班室，大声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所说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她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2月2日晚10时，江青叫我给周总理、张耀祠和主席的医生打电话，请他们12时到怀仁堂开会，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江青还特意告诉我，通知姚文元也参加，他年轻记忆力好，叫他认真作记录，将来叫他作证。我把江青的原话在电话里告诉了姚文元。姚说：“我一定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按时与会，请江青同志放心，将来如果有事我会作证的。”

第三次是2月3日下午1时左右，周总理拿着一小瓶药来到怀仁堂东厅，与江青商量给主席服药的问题。总理说：“医生推荐了一种药，建议给主席服用，为了慎重起见这种药我先吃了，没有感觉有什么副作用，建议给主席服用。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如何？”江青听了以后对总理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说了，我请文元同志来，请他作证，他年轻，记忆力好。”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叫他立即到怀仁堂来。姚来后，我告诉他事情过程，他听了以后说：“我明白江青同志的意思了。”于是大踏步地进入东厅。

第四次是3日晚上8时，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专题研究主席的治疗、保健问题，周总理主持会议。江青在会上讲：“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江青再一次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毛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这番话，江青连续讲了两遍，没一个人附和她。等到主席的身体状况平稳后，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了主席。主席听后，对江青的表现和言论很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

有一天，我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主席要家里人到他那里开一个会，请江青同志去。”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叫我打电话问问总理，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谁。我遵嘱给总理打了电话，总理说：“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东兴同志、耀祠同志、我，还有江青同志。”我报告江青时，她对我说：“我建议再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文元同志，因为他年轻，记忆力好，主席用什么药，主席有什么指示，以后姚文元可以作证。”我给总理打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时，总理说：“这样做不好，名单是主席定的，不可能随便改动。”江青才没有如

愿。在我给总理打电话请示之前，江青叫我先给姚文元打个电话，叫他做好准备，怕到时找不到他。江青有把握地说：“我想总理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当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时，他丝毫也没有犹豫地说：“好好好，我去我去。”表示甘心情愿地去为江青作证人。

江青以家里人的身份，准时到达毛主席的办公室兼书房，准备研究主席用药和听取指示。江青没有想到，毛主席当着周总理、汪东兴、张耀祠的面，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席的一顿批评，使得江青低下头来。这样的结果叫姚文元作证，能证明什么？

姚文元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不该都听江青的，我对不起总理，对不起傅崇碧同志，向他们道歉。”

二是批判姚文元助纣为虐

1972年8月12日，江青在北京会见维特克，姚文元陪同。8月25日至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在广州谈了6次，谈话中江青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中央其他领导人，并大量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为此，毛主席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切姚文元是知道的，他不但不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还多次为江青修改谈话记录、封锁消息，助纣为虐。

批判人说：“江青谈的内容，应不应该向一个不了解的外国人谈？”姚文元答：“当然不应该。”

“既然不应该，你为什么封锁党中央、毛主席，掩盖江青的罪行？”姚这时说：“我认错，我认罪。”

批判人说：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江青把记录稿送给了周总理一份，总理召集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总理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办法追回。”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1973年3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查询维特克在同江青谈话以后，回到美国写了一些什么文章，朱穆之遵照总理的指示进行了搜集。1974年初，外电、外报、外刊开始报道有关情况，其中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这些情况都被姚文元扣压。姚文元给朱穆之打电话说，“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许登刊登报”，极力掩盖、包庇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罪行。

姚文元听了以后，说：“你们批判得对，在这件事上我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是批判姚文元编造、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说起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主席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华国锋随即就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王洪文和江青也亲笔记录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姚文元竟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六个字改了三个字，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并在他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大肆宣传。

“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实质，就是按照“文革”时期的方针办。姚文元说：“毛

主席逝世前后，我们感到形势很紧张，我们认为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以至少在短期内保持形势的稳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会马上就发生。”他无可奈何地说：“政治斗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 王洪文心虚恐惧

12月2日上午对王洪文进行了批判。王洪文看上去身体很不好，面色青紫（据说他以前患过肝炎），精神呆滞，内心恐惧。批判王洪文，主要针对三个问题：

一是游手好闲辜负期望

工作人员说，1972年9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把你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进住钓鱼台作为接班人培养。11个月后的1973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可谓一步登天。你本应谦虚谨慎，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努力进取，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可你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成了花花公子。钓鱼台是国宾馆，经常有重要外宾在这里下榻，且住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也经常在那儿办公和休息。你却在那里毫无顾忌地打猎、射击、钓鱼。你配备了高强度照明设备的越野吉普车、有充足弹药的高级猎枪以及盛猎物的容器等，打猎的次数很频繁，隔几天就打一次，且次次均有收获。到郊外打野兔，到玉渊潭公园打野鸭。你打枪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出了楼门就开枪射击。离你王洪文居住的十六号楼不远处有一座小桥，这里行人和来往车辆较多，小桥的旁边有几棵高大、挺直、苍劲的古松，成了你练习枪法的靶子，被你打得遍体伤痕。工作人员从这里路过时，提心吊胆，就怕你打枪。为了保护水质和维持安静优美的良好环境，钓鱼台管理局规定严禁钓鱼，你不管这些，经常在钓鱼台钓鱼。毛主席说过：“钓鱼台无鱼可钓。”你是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寓意不懂，还是有意对抗？当你钓上了一条大鱼以后，对工作人员说：“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这不是钓了一条大鱼吗。”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那时，我忘乎所以了。”

二是另立中办架空中央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9月10日，王洪文就派工作人员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王洪文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要求重大问题直接与米士奇联系，企图切断各地与党中央、华国锋同志的联系渠道。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向米士奇转达王洪文的话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件事，一个是毛主席的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问题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米问：“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吗？”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批判人问：“王洪文，情况是这样的吗？”

王洪文一边擦汗，一边回答：“是这样的。我在这个问题上严重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三是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7日，“四人帮”有预谋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以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跟“四人帮”作了坚决斗争。当时“四人帮”在钓鱼台进行了密谋，18日即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

的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现在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四人帮”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实现组阁的阴谋。毛主席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主席指示唐闻生、王海蓉回北京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主席还指示唐闻生、王海蓉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批西。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诡辩说：“我那次去长沙，不是告状，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是政党的组织关系。”批判人立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反驳。在事实面前，王洪文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光明磊落，不光明正大”，是“搞阴谋”。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退休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 《同舟共进》 2010年第1期

~~~~~

## 【史林一页】

### 百问九一三（九）

• 舒 云 •

#### 46、为什么中国没有要256三叉戟上的黑匣子？

关于256三叉戟的坠毁过程，也许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了吧？

且慢，还有神秘的黑匣子。人都死了，惟一能“说话”的黑匣子没有“死”。飞机从起飞到摔毁118分钟，差两分钟就是两个小时，在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飞机里发生了一些什么？因为始终没有公布飞机上的黑匣子，有些说法就无法令人信服。

飞机失事，首先就是尽快找到黑匣子，这是每一个调查组首要的任务。256三叉戟是在飞出国境40分钟后坠毁的，黑匣子的作用更是非同一般，怎么就没人提及呢？

或者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飞机上还有黑匣子，至少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官员们对黑匣子一无所知。最先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说：中国人没有拿黑匣子。当时我们对飞机并不认识，更不知道黑匣子，那时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不懂，想不到提这方面的要求，国内也没有索要黑匣子的指示。所以，在对蒙古交涉时，我们连提也没有提。以后研究这架三叉戟，也从来没有提过黑匣子。到了1972年，空军专家分析三叉戟的失事原因，只是凭着照片从技术上分析，仍没有提及黑匣子。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大型喷气式飞机上都装有黑匣子。

国际上关于空难事故的调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事故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的？详细经过如何？二、如果机组的人活着，采取了哪些应急措施？三、分清事故的责任，是人为的，还是不可抗拒的？四、事故的教训经验。五、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应当采取哪些措施？为了使制造厂家和用户都能从事故中吸取教训，参加调查的不仅有民航和飞机的用户，而且也有厂家代表。不管空难发生在何处，都会引起世界广泛的重视，并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

在调查中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水落石出。

但是，由于空难中首先丧生的往往是驾驶人员，这给事故调查带来困难。因此，飞机上的黑匣子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黑匣子直径30到40公分，像个圆球，在安装和定位装置等方面都具有最大的自我保护能力，长时间在火中也不会损坏，以使记录的数据能够被保存和复原。最初黑匣子是黑色的，因为失事后黑色的物品不好寻找，就改成桔黄色，以求醒目。但因为黑匣子叫顺口了，就一直叫黑匣子。

黑匣子又叫飞行数据\语音记录器，是按时间顺序记录飞机飞行全过程信息的记录仪，尤其是飞机在特殊事件中的行为信息。为发现隐患、查找事故原因提供不可缺少的依据，也为训练飞行员和进行飞机设计提供必要的真实参数，所以是不可缺少的机载设备之一。

过去老式飞机上没有黑匣子，出了事很难查清。20世纪40年代人们已经重视飞机的记录，50年代起安装在飞机上的是简单的记录器，只能记录几个参数。由于计算机的发展，6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在飞机上装黑匣子，把飞机上的技术信息编成密码，记录下来。

现代飞机上一般有两个黑匣子，机尾一个，机头一个。机尾的一个记录飞行数据，能持续监控和记录100多项，包括飞机的高度、速度、爬高速度、垂直加速、飞机磁偏角、发动机及工作状态、稳定性能、承受重量、外界温度、气压、风速、机舱内环境等，对飞机事故高发区的起飞和着陆的记录更加详细。机头的语音记录器记录飞行员的谈话信息，驾驶员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每一次与地面塔台的联络、都有详尽的记录。到飞机失事止，至少保留前30分钟的所有信息。这无疑是飞机失事原因的不可缺少的判断材料和分析事故发生过程的宝贵依据。两个黑匣子对照，在不同高度、不同阶段、不同飞行状态下驾驶舱内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飞机起飞后和迫降前两个最为关键的时刻就可以再现出来。

黑匣子能抗高温和强烈振动，保证信息能拿出来。

所以，256三叉戟上的黑匣子肯定在！

黑匣子肯定不在中国人手里，不是在蒙古人手里，就是在苏联人手里。

蒙古有人以个人名义说过，黑匣子刚开始在蒙古人手里，后来被苏联人拿走了。苏联人不管是官方还是个人，都没有提到过，好像这架三叉戟上从来就没有黑匣子一样。只有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调查九一三事件时，到苏联采访时听说256三叉戟的黑匣子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声音。看来，苏联人已经“解剖”了黑匣子，也得知了黑匣子里的秘密。

#### 47、苏联为什么还在“收藏”256三叉戟的黑匣子？

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飞机故障？操纵错误？机内搏斗？导弹击毁？人为破坏？油箱爆炸？还是飞行员疲劳？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派专家进行事故调查，目前惟一的知情者只能是那个黑匣子。

256三叉戟的黑匣子被苏联人“收藏”快40年了。苏联早已经解体，当年不可一世的克格勃也早“死”了，为什么256三叉戟的黑匣子仍秘而不宣，不还给中国？

因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过！

如果要，苏联人会有三种选择，给或者不给，或者干脆说谁拿你们的黑匣子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知道了苏联政府的态度。而现在，苏联政府对256三叉戟的黑匣子是什么态度，我们根本不知道！

现在想，林彪虽然官至老二，红得发紫，却是一个“孤家寡人”，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谁谋过私利。而他的老部下也因九一三事件断了官运，所以，高层中没有人替林彪说话。不像刘少奇，有个难兄难弟，第三次登上高位后，替刘少奇平了反。如果刘少奇不平反，“他”也平不了反！

其实，林彪平不平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而黑匣子，是九一三事件实事求是的前提之一。

关于黑匣子，有人说256三叉戟上没有装，这似乎不可能。更多的人包括三叉戟机组的人员都肯定飞机上有黑匣子，不可能不安。空军必须设备齐全，设备不全不能上天，更何况是第一号专机。但这一切都是假设，遗憾的是从三叉戟的公开材料里找不到关于黑匣子的记载。到底256三叉戟上有没有黑匣子？谁也没见过，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资料中找到一些线索。中国民用飞机如伊尔-18、安-24、三叉戟和波音737等都装有黑匣子，但结构简单，记录参数较少，一般记录5至9种或十几种参数。英制三叉戟在60年代中期投入航线飞行。现在这种飞机是远远落后了，但在1971年，还算时髦。但是我们是从巴基斯坦购买的，并没有直接与厂家沟通，因此对三叉戟的性能并不那么清楚。

三叉戟从IE型开始，已经在机尾装上黑匣子。在256三叉戟摔毁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飞机尾翼高高翘起，说明黑匣子应该完好。更何况黑匣子有一层厚厚的“保护”，火中水中都可以安然无恙。苏联人两次到坠机现场，一切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包括飞机上的发动机，包括林立果从北京带上飞机的20多个箱子，以及手令、航图等，全被苏联人“一网打尽”。人们推测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苏联人在拆走发动机的同时，拿走了黑匣子。苏联人连三叉戟上的主发动机都能拆走，一个小小的黑匣子更不在话下。据彼得·汉纳姆的调查，黑匣子是被苏联拿走了。为什么苏联人这么沉得住气？他们连林彪的头颅包括假牙病历都公布了，黑匣子为什么不公布？当然，没有公布的还有他们两次在现场拍下的一批照片以及他们拿走的三叉戟上的那一批箱子。

为什么时隔近40年，256三叉戟黑匣子仍不露面呢？

三叉戟飞行员康廷梓在进行三叉戟理论学习和飞行训练时，教员没有提及黑匣子。因为黑匣子与飞行员飞行无关，正常飞行时它“袖手旁观”。而且它“藏”在前舱顶上，只露一个小小的网状口，连个电门也没有，不出事谁也想不到它。就像平时放在房间里的灭火器，一旦失火才成为“英雄”。如果黑匣子像保险丝一样可以拔下来，或许可能被破坏，那黑匣子在关键时刻就“冲”不上去。所以谁也不能拿下来看看，更不能人为控制它。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可能，黑匣子正常不正常无从知晓。只有在出事后，黑匣子送到实验室，由专家打开，才能知道黑匣子是不是正常工作。至于密码能不能被破译？破译的密码能不能解开？都还是未知数。英美等国专门有关于黑匣子的研究机构。黑匣子很复杂，你用它的飞机，出事要找它翻译，要花很多钱。苏联搞黑匣子很晚，是另一套。也有人说，黑匣子找到也没用，不能说明为什么迫降？另外话录音器是不是好，不敢保证。

当然，黑匣子也不是“神仙”，1999年，埃及航空公司飞机失事的两个黑匣子先后从海里打捞上来，对语音和数据“左”分析“右”分析，也没分析出所以然来。只知道失事前飞行员发现了飞机的某个问题，而且正在设法解决。不过直到飞机失事，飞行员也没有弄清飞机

究竟出了什么故障。美国有报纸说飞机员要自杀，遭到埃及政府的强烈抗议。

或者，有了黑匣子，事故结论也不一定就能非常精确。但是，有了黑匣子，总是可以知道256三叉戟最后半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这个黑匣子在苏联手里，也有几种可能，或者破译，或者不感兴趣，扔在一边。如果破译，是不是应该请英国人帮忙？可是没有。要是说苏联人不感兴趣，恐怕也不会。他们为什么又第三次去温都尔汗荒原，把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拿去进行分析呢？很可能他们不相信中国人公开讲的那些结论，还要独立证实一番。那么他们可能独自破译，有结果或者没有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如果这个神秘的黑匣子仍“活”在世上的话，那么，256三叉戟上最后半小时的录音恐怕就会让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

#### 48、蒙古政府为什么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中国大型飞机坠毁蒙古境内，死亡这么多人，这在蒙古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256三叉戟的坠毁地点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离中蒙边界至少350公里，是蒙古的纵深地带，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在坠机一天多以后，9月14日上午8时，刚上班，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半个小时后，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受政府委托，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王中远回忆：蒙古方面说，有一架中国飞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事故，有9个人，当时提出口头抗议，让我们做出解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九一三事件正好在“文革”中间。受极左影响，中国一直反修，反对苏修、蒙修，与苏联处于敌对状态。蒙古紧跟苏联，军事配合，制造很多事端，两国关系非常紧张。那时蒙古每天的广播都有反华的声音，只要集会，必定要反华。我们翻译注意听，只要听见“反华”两个字，后面就不听了，拍屁股就走，这样的退场很多。

以前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连大使都没有，长期缺任，由二秘代办，后来来了参赞当代办。到1971年，两国关系开始缓和，不再像1969年珍宝岛战斗后剑拔弩张，双方重新互派了大使。1971年8月20日，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刚到任才20多天，因馆务繁忙，他还没有拜会蒙古的这位外交部副部长。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突然约见许文益大使，这是非常反常的。就是正常约见，也应该事先有拜会，没有拜会不能约见。而这次，事先也没有预约，显然事情又重要又急迫。

孙一先回忆：但是，完全没想到是中国喷气式飞机失事。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很吃惊，猜测，很多猜测。

一般讲，军用飞机、战斗机不可能上九个人，太多了；而客机一般也不会只有九个人，又太少了。看来这架飞机非同寻常。不是战斗机，又不是客机，是不是专机？这么大的飞机，至少不是一般人，肯定是首长。

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为了显示友好，没有在会客室谈话，而是把许文益大使请到他的办公室，并摆放了糖果和烟茶。他首先对还未正式拜会就紧急约见表示歉意，然后说受政府委托通知：9月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说：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有关部门也是到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中国喷气式飞机失事的情况。经多方查证，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乘员九人，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可以认为是侵犯了我国领空，我有关方面正在继续调查，我们保留对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蒙古首先抓住主动权，把责任和可能的责任推得一乾二净。蒙方不明原因，推托也是可以理解的。小国嘛，中苏对立，它夹在中间，怕咱们做文章。虽然是摔了，但你是军用飞机，毕竟还是侵入了人家的领空，先下手为强嘛。

可是越境的飞机没有攻击行为，而且机毁人亡了呀。

许文益大使是老外交官了，外交经验丰富，处理过很多重大事件，他思索该如何回答。

额尔敦比列格放缓了口气，说我第一次与您正式见面，很遗憾提出这样的问题。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并希望你们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给予正式解释。

许文益感谢他的通知，说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没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还说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空失事，这当然很遗憾。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我不知道蒙古方面对失事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另外出于友好方面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这架飞机是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今天我与副部长第一次见面，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改善。

最后，许文益大使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人到出事地点看看？

额尔敦比列格作了一些解释后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了，但只发现九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现在天气还热，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需要以某种方式掩埋。大使提出派人到现场，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你们的正式要求？

许文益大使说，可以这样理解。

额尔敦比列格说，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做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近期做出解答。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如此这般，似乎蒙古发现了失事飞机的某些秘密，急切想知道更多。

蒙方对这次飞机失事的态度还比较克制，虽然口头抗议，但语气缓和，很快同意并安排我们到现场视察。

9点30分，许文益回到大使馆，决定立即向国内报告。

当时大使馆没有电台，只能通过蒙古电报局。但蒙古电报局说，线路不好，最快也要四个小时以后。急中生智，许大使想到大使馆有一条直通北京的专线，那是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高频电话线，北京和乌兰巴托也顺便安装了一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专线电话也就关闭了。半个小时后，要通了北京，但北京电话局说外交部的机器坏了。

许大使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通知外交部有重要情况报告，要求启用专线电话。

经过一番周折，14时20分报回失事飞机的情况。

49、为什么说256三叉戟是中国民航？

这个问题其实不言而喻。

256三叉戟的残骸上，清清楚楚地刷着巨大的四个红字：中国民航。

1970年初，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四架英国三叉戟后，立即在这四架三叉戟上刷上“中国民航”的字样。在与巴基斯坦谈判引进时，也是说要作为民航用途。如果谈判时，说军用，巴基斯坦不可能、也不敢卖给中国。因为当时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封锁中国，巴基斯坦不可能得罪强大的西方国家，而独独讨好在世界上孤立的中国。

所以，九一三事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在与蒙古外交部交涉时，坚持256三叉戟是“民用”，这是坚持国家利益。如果说“军用”，那就是卖国贼了。

更何况，256三叉戟的性质是专机，但还是“民用”，并不是“军用”。因为“军用”的性质是用于武装军队，言外之意就是侵略，而256三叉戟不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强调256三叉戟是“民用”，是“误入”，这是底线。

如果有谁敢对蒙古说256三叉戟是“军用”，那就是承认中国入侵蒙古。

想来也没有中国人想当这样的卖国贼吧？

蒙古外交部强调256三叉戟是“军用”，但并不硬气，因为256三叉戟残骸上的“中国民航”四个大字并没有毁掉！他们看见了。否则，蒙古绝对会提出书面抗议，而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50、中国人在256三叉戟坠机现场看到了什么？

看来坠机现场的火烧得很大

爬上漫坡，首先进入眼中的是倒梯形的焦黑草地。

站在高处望去，256三叉戟是由北向南迫降，着陆点正好在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南半部。飞行员对迫降的地点有选择，飞机从低向上走，以此增加一定的阻力。

这是一块被牧民称作苏布拉嘎的不太规则的长方形盆地，除了西边是向下的漫坡，其它三面都是起伏的土丘。盆地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平坦得就像人工铺成。到处是没膝的9月干草，草根盘结，脚踩到沙土上有种软绵绵的感觉。

许文益问：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蒙方说：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在蒙方撰写的《现场调查纪要》中，说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

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

蒙古警察图瓦尼·久米第一批到现场，他看见三处大火。后来美国新闻记者问他，他不知道哪一处先起火。他从车中下来，没走两步，几乎被什么绊倒，地上是一具背朝上的尸体。黎明时的现场是一幅可怕的场景，九具尸体散成一线，大火几乎烧光了他们身上的衣服，只剩下手枪皮套和腰带，当天从200英里外的首都乌兰巴托赶来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杜格瑟仁金·额德毕力格说，几乎不可能辨认出飞机上任何一个人。但飞机印记、毛像章、笔记本等，都表明这是中国人的飞机。

蒙古外交部司长高陶布进一步解释说，凌晨2点30分左右，贝尔赫萤石矿的夜班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随即发现东南方一片火光。连忙叫人，分乘两辆卡车到现场灭火。蒙古政府有规定，草场着火，必须马上扑灭，否则要受罚。工人到达现场，火势还很猛，透过火墙看到失事的飞机。他们一面扑火，一面向温都尔汗当局报告。伊德尔莫格县的牧民也赶来了，一齐把火扑灭，这才看见九具尸体。等省里来人，天已经快亮了，这才调公安部队看守，并报告乌兰巴托。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同志看过现场后说，飞机冲出1000多米，第一次落地没爆炸，跳起来。第二次落地折断了右机翼，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撞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

从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向南，呈倒梯形，约800米，宽30至200米的草地全部烧焦，散落一块块飞机残骸，靠近焦土的南部，是散落的尸体。盆地中央，有一道由北向南的S型擦痕，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压实，说明飞机是肚皮擦地着陆。飞机弹跳了30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机身似乎失去平衡，倾斜触地。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积越来越广。最北头飞机翅膀擦地的痕迹很重。飞机肚子擦地平衡，翅膀擦地产生高温，就产生爆炸，速度很快，一个翅膀擦地翻滚爆炸。标有“256”字样的翼尖断成两半，一个断机翼上写有“中国”两个大字。

最显眼的是机头西北60米处斜卧的机尾，有三层楼房那么高，是从中发动机的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一段发动机外壳与尾部连结。再往前，逐渐看到机身的较大碎片，机身的蒙皮，发动机底部的包皮，很大的弧形机身，连着摔碎的舷窗，炸瘪的发动机尾端喷口，一扇门从合页连接处炸开……

孙一先注意到一个炸掉大部分外壳露出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末端断裂处露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杂乱电线，有的电线露出铜丝，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个碎片。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里，支撑斜卧的整个机尾。垂直舵前竖板上是喷涂的五星红旗，旗下方是机号256。

许文益叫多拍些照片，仔细观察失事原因，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二秘孙一先爱好摄影，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抓紧黄昏前的光线拍了好多卷。回国汇报时没带全部照片，只是挑了一些好的，剩下大量底片留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这些底片还在不在？

51、中国人提出要回256三叉戟乘员的遗骨了吗？

中国人提出要回尸骨，但不了了之。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亲自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电，大意是：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奉政府指示，讲明三叉戟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 and 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应死难者家属的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把九具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的所有遗物交还我方。

因为9月的白天还比较热，蒙古方面建议就地安葬。

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飞机上，由于中国政府道了歉，也没有再为难。但他们很“狡猾”，要求中方提供死者名单和身份。周恩来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

两天后许文益催问运回遗体，还催要死者遗物。

蒙方态度又强硬起来，反问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做出书面正式解释？策伦朝达勒司长说：今天已经是25日，中国政府还未就中国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正式解释，对此只能表示遗憾。既然遇难人员的身份已经清楚，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希望中方将他们的姓名、年龄、职务和照片提供蒙方。蒙古政府只有在研究中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后，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予以答复，如果你们拖延答复，会不会产生不适宜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

处理国际空难，哪要有死者职务和照片的？有点太“热心”了吧？还非要对方写一个为什么“误入”的书面材料。他们明明知道中国不会接受，为什么这样无理要求呢？孙一先认为，看来，蒙方如此强硬，与飞机失事以来国际上的纷纷传闻不无关系。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经揣测失事飞机上有大人物，究竟是谁还不能断定。因为苏联要对死者尸体进行检验，所以蒙古当局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运回尸体。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国高层首先要保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让林彪在飞机上的事实扩散。只有保住密，才能把引发战争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故，迷航嘛，误入蒙古。所以中国没有坚持要回尸骨。

王中远回忆：国内没指示，我们不好行动，包括遗物。

在第二堆和第三堆尸体间，有一个方形食品柜，旁边是一堆搜集起来的杂物，有一堆鞋子，有飞行人员的两个图囊，一个烧剩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打开看，里面的航图没有了，只有几支红蓝铅笔和黑铅笔。图囊旁是一堆手枪，一共六支，还有一支微形冲锋枪。子弹散乱放着，还有两个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没有发现空弹壳。还有一个64开的小本子，后来才知道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中国人问：为什么要一起堆放？蒙方解释怕丢失。

估计在中国人到达之前，蒙古人和苏联人对现场进行过整理。

机上的人不可能背空文件包走嘛。

许文益回忆：对现场的初步看法是，一、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了尸体，并承认有些档已经搜集保管起来。草地上还拾到九块手表等，个别烧坏，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二、飞机是由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都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时失去平稳，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三、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是何人，为何在蒙古失事？现场的情景使许文益感到问题重大复杂。视察完毕，天已经黑透，蒙方一再提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提出马上选择墓地，连夜挖墓穴，明天安葬。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表示同意。

## 5 2、为什么高炮和歼击机都没有打下直升机？

9月13日凌晨3时30分，张家口地区某炮师接到军区空军命令，雷达开机，进入一等战备。副师长问：怎么没有演习背景？4时55分，某团报，雷达发现目标，发现敌机。是否装填炮弹？装填！严密跟踪敌机。敌机？不是演习吗？什么演习？这是打仗！你们作战空域无我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命令打掉它。几个炮营一片混乱，火炮不能连动，指挥员无法协调配合。4时59分，目标进入炮团火力范围，副师长下令可以射击。但阵地火炮故障，指挥仪无法正确指挥，5时零3分，目标飞出。

这就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坐的那架直升机。

9月13日，天还没亮，在首都机场值班室担任值班首长的张瑞霭，睡中听见一片飞机声，走出室外，看空中歼击机乱糟糟地穿梭。非常奇怪，按规定，从国际场上空飞过要预报，可这么多歼击机却一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去哪里的？要干什么？张瑞霭赶快跑到指挥塔台，打开对空联络器，耳机里全是回来吧，只有飞回来，才是光明，才有出路。民航北京管理局的几位领导也都陆续跑来，不知什么事。以后才知道那么多歼击机是要拦截外逃的直升机。当天，所有的飞机实行军管，路口、机库、停机坪飞机旁都由持枪战士站岗，机务人员检查飞机，机组执行任务，凡是接近飞机，都要经过岗哨检查，发放“通行证”，方能通行。

北京军区作战部参谋刘建林说，指挥所有情况，闹不清真假，一般不说，工作人员就执行。图板上看不出来。雷达清楚，我机来不及起飞。直升机在北京周围盘旋，还是搞不清敌机我机，歼击机上去迫降，敌机我机定不了，上边讲不能定性，敌我不能定性。实际上知道空军有情况，特绝密，很久以后才知道。直升机起飞10分钟，场站给指挥所报告，梁璞问什么时候起飞的？10分钟以前，为什么不报告？回答走以前不让报，周（宇驰）副主任让推迟报告。梁璞说，没有六个人联合命令不准起飞，知不知道？知道，他拿了林副主席的命令。梁璞不好再说什么。赶快报告吴法宪。吴法宪报告李德生，说打下来。

李德生让八架歼六起飞。李德生从来没在空军工作过，根本不懂，那么多飞机，怎么起飞？又是夜间，自己撞自己。歼击师领导弄不清，问谁的命令？明明是外行嘛。空军参谋长梁璞火了，吴司令的命令。吴法宪的命令？指挥员心里还打鼓，打直升机？直升机只有专机师有，那是专机，与中央头头关联很多，打专机干什么？这是有历史教训的，1955年，南海上发现英国一架运输机霸王号，以为是敌机，我们的两架拉11轮番攻击，把它打了下来，又向人家道歉，又赔人家多少万，挺大数字的美元，两个飞行员都判了刑。毛泽东下决心，飞行师长先撤职，后查办。当时普遍进行了教育，航空兵部队都知道。现在突然让打直升机，文革又那么乱，梁璞传达，又不是吴司令亲口说的，可不起飞又不行。按二级战备的要求，打信号弹就开车，半分钟起飞。而这回三四分钟才起飞了一架，慢慢来，在机场上空爬高。周围有山，撞山

怎么办？撞电线怎么办？其实完全可以直接起飞，雷达引导就行。起飞半天了，标图板上还在转圈。梁璞火了，怎么总在机场转，还不出去？磨磨蹭蹭转什么？批评了以后，才飞出去。雷达引导，准确向直升机飞去，歼五甲离直升机很近，航迹都重合了，就是报告没发现目标。按常规条件应该发现，你没法批评，飞行员就是没发现，顶多是不主动。引导吧，汽油快烧完了，要返航。不让回？不让回，就摔了。回来吧，再起飞一批，两架，还是没发现。

虽然天还没亮，夜航独立大队的作战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头一年刚击落过一架敌机。梁璞说直升机上有坏人，一定击落。师值班员不能不考虑，究竟是什么坏人。本来六人命令才能起飞，不长时间，吴法宪一个人命令就起飞了？文革以来有多少好人？判刑，受处分。敌人明确好打，打中央的专机还得了？只能“消极怠工”，最终也没有发现。

天亮了，直升机主动在怀柔附近迫降。

### 5 3、为什么周宇驰逼直升机也往乌兰巴托飞？

周宇驰向林立果报告“禁飞”令后，离开工字房，开车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这一段时间，叶群和林立果决定按第三个方案到苏联去。临去机场前，林立果给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周宇驰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窗户开着，加上线路不好，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大，所以周宇驰妻子王圣兰听到几句。上哪儿？上哪儿？哦，北上啊。于是周宇驰匆匆安排好了“后事”，说他暂时要离开北京，让他弟弟把他母亲带到西安去。几千元存款也取出来了，让他们带走。周宇驰和王圣兰把周宇驰母亲和弟弟送到北京火车站后，周宇驰回到空军大院，把王圣兰放到楼门口，连车也没下，就飞快地走了。临走周宇驰扔下一句话，王圣兰也没听清，好像是别等我。周宇驰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北上”。因为他知道禁飞令下了，不可能调大飞机了，而直升机飞不了那么远，所以他的目标定在乌兰巴托。

周宇驰拿着一张竖写的林彪手令，打电话找到在西郊机场待命的副大队长陈士印。虽然云雀直升机就停在西郊机场，但已经禁飞，他开不走，而且云雀没有直五飞得远。只好到沙河机场“碰碰运气”，而且直五飞得更远。周宇驰对陈士印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我们要赶快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里汇报情况，你送我们一下。陈士印说，我改“云雀”后，很长时间没飞直五了，怕没有把握啊。周宇驰晃着手上的纸片，这是林副主席手令，你不能怕担风险。陈士印说，那我再找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样更保险。这事要不要跟胡（萍）副参谋长说一下？按规定间断驾驶时间较长的飞行员复飞，需要经上级批准。周宇驰说，现在胡副参谋长被困住了，没有办法与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与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陈士印说，我没带图囊，怎么办？没关系，我给你准备好了。1时40分将东西装上汽车，开向沙河机场。

周宇驰会开直升机，陈士印是周宇驰训练直升机的指挥员。1971年4月，胡萍对分管直升机的副师长下令，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身边要求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安排。三个多月，周宇驰飞了66个飞行日，75场次，184小时，掌握了空中飞行和领航的知识。陈士印把中队长陈修文叫起来，周宇驰打开车厢照明灯，让陈修文看了手令，说有紧急情况，到北戴河，要绝对保密。直升机上了天，他马上命令往北飞。

320度？不对吧？陈士印首先质疑。对的，周宇驰肯定地说。我到底听你们谁的？为什么飞320度？这是上张家口、包头方向。去乌兰巴托。两个飞行员大吃一惊，这是专机师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所有空勤人员的航行资料包里都不许有境外的任何资料，更没有境外地图。我有，周宇驰掏出200万分之一的地图，陈士印接过来，放在两名飞行员之间。地图上有一条粗重的红线，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北京到伊尔库茨克1700公里，而直五最远

只能飞350公里。按周宇驰的要求，飞2600米高度，爬高到3600米。正好头顶上有歼击机飞过，趁周宇驰向窗外望时，陈修文将罗盘从320度调到140度，骗周宇驰罗盘坏了。空中任何动作都可能造成飞机失衡甚至坠机，陈修文采用侧滑与倾斜相结合的动作，转弯半径大，但坡度小，不容易感觉出来。几次想降落没降下来，最后飞到怀柔山区。这是平原与山区的交界地带，直升机在这里搞过野外迫降，技术上有把握。

在离地还有30米时，周宇驰开枪打中陈修文左胸，没流多少血。陈士印大喊，为什么要动枪？30米的高度也不得了，陈士印试探性向正前方推驾驶杆，没稳住，第三次缓解，尾部和右轮先接地，还好，没侧翻。一旦坠地就要起火，机上的大量材料就会被烧毁。陈士印的双肩被周宇驰死死按住，6时47分降落在沙峪，他迅速关闭发动机和放大开关。陈士印看窗外有人影，迅速向右前方侧过头。于新野的枪响了，子弹顺陈士印的后背滑向腰部，却没有伤着老陈，只在他的夹克上穿了四个洞，击中了周宇驰的手腕。飞行员体检时要求具备180度的视觉范围，以及飞行训练中熟练而全面的注意力分散，这使陈士印及时躲开，否则驾驶舱那么小，根本躲不过这一枪。几个小时后，卫戍区把陈士印接走。

54、九一三之夜，林彪知道飞往苏联吗？

林彪临走对内勤小陈说：去大连。

到目前为止，只有李文普说林彪说到伊尔库茨克。除此林办工作人员再也没有林彪知道去苏联的证据。

也有人说，256三叉戟本来是想到广州去的，半路才改道往苏联飞。这话不对。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周宇驰在直升机起飞后，说“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在乌兰巴托降落了，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因为林立果临去机场前给周宇驰打过北上的电话。

林彪不知道飞往苏联，不等于林彪家人也不知道。

实际上，林彪别墅早在几天前就开始做投奔苏联的准备了。

9月7日9时50分，叶群让公务员通知在毛家湾的秘书李春生，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等几本工具书找出来，叫送林豆豆到北戴河的飞机带来。当时离飞机起飞只有十分钟了，为了带这些书，飞机推迟了一个小时起飞。

9月7日21时30分左右，叶群叫总参二部参谋倪煜去讲课。倪煜专门给她讲各国的概况，按原计划，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叶群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倪参谋回答说有乌兰巴托、沙音山达、苏赫巴托尔、科布多等。这些城市有没有北戴河大？听去过的同志讲，比不上我国的中小城市，房子都是我们帮助盖的。叶群还多次询问中苏边境的情况，问蒙古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有哪些机场，机场的位置等。看到叶群这么有“兴趣”，倪参谋为了讲得更清楚，还特意从总参二部要了一些图表资料。

9月8日9时，周宇驰打电话给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一份北京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周宇驰还对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王永奎说，叫情报部给我搞一份我国周围电台的频率表，明天交给我。大概是太复杂，9月11日，周宇驰又要简单的周围各国对华广播频率表。

9月9日下午，周宇驰在办公室对雷达兵部技术处副处长许秀绪说，林副主席要你给他搞

一份雷达探测图和开关时刻表。许秀绪问，要全国的，还是要哪个地区的？周宇驰说，只要“三北”地区的。许秀绪报告了部长后，下午交给了周宇驰。由于雷达站很多，开关机的时刻表比较复杂，许秀绪只是把雷达开关的原则告诉了他。

9月11日11时多，叶群让毛家湾把全军副军以上的干部花名册和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送来，说首长过几天要到大连，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叶群还让毛家湾送来一大堆呢子大衣等冬季服装。

因为九一三之夜走的太急，叶群专车的后备箱里，准备好的文件和行李并没有带走。

（未完待续）

□ 选自 舒云\_新浪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